

吴荪甫的民族意识辩疑

武 斌

吴荪甫是个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舞台上。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身陷“国家不象国家，政府不象政府”的绝境。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使中国加深了殖民地化。在这关键时刻，吴荪甫急流勇进，敢于同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势力抗衡，矢志振兴民族工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行为。而支持这个革命行为的力量源泉，我们认为来自他灵魂深处的民族意识。由此视点进行观照，吴荪甫就不仅区别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而且也区别于同样是民族资本家的朱吟秋、陈君宜等人。然而，长期以来，随着吴荪甫所代表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价值变化，对吴荪甫的评价也一直上下波动，褒贬不一。或认为他是“一个残酷剥削工人的反动资本家”，是“扼杀民族工业的刽子手”^①；或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②，因此，怎样公允评价吴荪甫这个特殊的艺术形象，就不仅对正确估价《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而且对繁荣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都十分必要。

首先我们认为，吴荪甫的民族意识表现出反帝倾向，与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是相合的。据有关材料记载，一九三〇年全国的丝厂比一九二九年减少近一半，即便以缫丝业发达著称的上海为例。是年的丝车数也仅占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八，^③而工人总数却几乎未减^④。毫无疑问，这样的局面，必定加速劳资关系的紧张化，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吴荪甫也为这不景气的现象发过牢骚。然而，当屠维岳告诉他工人闹工潮是被“鬼迷了”时，他立刻清醒地指出：“我知道这个鬼！生活程度高，他们吃不饱！可是我还知道另外一个鬼，世界产业凋弊，厂经跌价！”^⑤在与工人的矛盾冲突中，吴荪甫能够自觉意识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才是自己最大最主要的敌人，这充分表明他是在反帝的民族意识支配下来审时度势的。亦

即他是站在民族工业的立场上，站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来审时度势的。面对日本在国际上的蛮横势力，他深感愤恨，力图排除这种势力在中国的影响，直至取而代之。因而，他认定“日本人开在上海的那些小厂是我们当面的敌人”，“要在竞争中给他们“一个致命伤”，同时，也认定“国际财神爷”赵伯韬“是我们背后的敌人”，必须与之誓不两立，公开分庭抗礼，大胆主动进攻。可见吴荪甫在发展自己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斗争对象十分明确。这种明确性，我们不能不说是由他民族意识从内在起着一定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把吴荪甫和赵伯韬放在一起作比较观照的话，那么，吴荪甫在民族意识下所激起的反帝倾向就格外显而易见。赵伯韬蓄意破坏吴荪甫的事业，决不是闹个人意气，也决非单纯出于金钱利害的考虑，而是涉及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他们之间的斗争反映了买办资本鲸吞民族资本、金融资本兼并工业资本的矛盾，这也是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矛盾的一个方面。面对赵伯韬吞并工业资本的残酷现实，吴荪甫义愤填膺：“这简直是断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已！”他不甘心在赵伯韬的淫威下苟延残喘，他要挣扎，要自强，要发展民族工业。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这几句内心表白，显然显示了吴荪甫在考虑自己事业的同时，也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联系在其中了。当然，吴荪甫在这里的爱国，与朱桂英、何秀妹等工人人们的爱国，是有本质的不同。但，我们认为，

- ① 赵开泉：《试论吴荪甫形象》，《茅盾研究》(1)，第 234 页。
- ② 黄平生：《一个失败的英雄》，《宁德师专学报》，1984 年第 1 期。
- ③ 《上海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 ④ 《茅盾文集》第 9 卷第 67 页。
- ⑤ 《子夜》1982 年版第 64 页。

只要民族解放的任务尚未完成，任何反对外来侵略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要求和行动，都具有革命的性质，都是历史的进步。从吴荪甫在讨论益中公司组织草案时的一番话，更可以看出他办企业的基本立场是：一要讲究民族工业的“实力”，二要一致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反帝倾向在此场合如此鲜明的流露，毫无疑问，与我们整个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渴望独立富强的历史愿望达到了完全的吻合。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指出当时的革命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据此论断来考察，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的代理人，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赵伯韬的斗争，就同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这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吴荪甫的民族意识，与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是合拍的。特别是，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如周仲伟、朱吟秋等）已经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历史背景下，吴荪甫却能独树一帜，誓与帝国主义、买办势力较量，企图力挽狂澜，拯救已陷于颓运的民族工业，其民族意识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煞的。试比较赵伯韬那洋洋得意的宣言：“中国人办企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以及周仲伟那恬不知耻的“心里话”：“中国的工厂迟早都要变成僵尸，要注射一点外国血才能活”。吴荪甫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同他们这种买办立场、掮客心理，洋奴口吻是何等格格不入，泾渭分明！

其次，我们认为，只有从民族意识这一视点出发，我们才能最后认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水岭，从而使《子夜》有力地批驳了当时托派们抹杀华、洋资本无差别的谬论，奠定了《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前不少研究者仅仅从阶级本性的角度来分析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行为，认为吴荪甫的事业心只是出于“资产阶级对于利润贪婪追求的本性”，他是“用爱国主义的漂亮言词掩盖其贪婪残酷的野心”^①。这种片面的分析导致了对吴荪甫矢志发展民族工业，要求国家独立富强的民族意识的进步性、合理性认识不足。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才能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如果我们是严格地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某些概念、定义出发，那我们

一定可以看到，吴荪甫始终没有放弃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并非仅仅出于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假如只以金钱为目标，他大可以象赵伯韬那样投靠帝国主义，走买办的道路。凭他的财、才、胆识，他的地位和牟取的实利决不会在赵伯韬之下。至少，他也可以象他连襟——金融界大亨杜竹斋那样“专靠公债、黄金、地皮吃饭”而大发横财。而且，吴荪甫在自己遭受严重困难的境况下，也发过如此感慨。但是“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促使他“还是要干下去”，顶风冒险，披荆斩棘去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宏图：“他工厂生产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可见，尽管同是资产阶级，吴荪甫的追求利润，不仅同杜竹斋、尤其同赵伯韬有着巨大区别，而且与朱吟秋、陈君宜等也有了区别——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继续分析。而这一不同点，正恰恰是吴荪甫民族意识的强烈性表现。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说到：“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②。吴荪甫这种发展民族工业的民族意识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他响应了摆脱帝国主义、独立发展中国经济的历史呼声，他的这种“意识”的强烈性，很明显是烙着时代、历史的印记的，决不能以“出于阶级本性”来一言以蔽之。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吴荪甫的这种民族意识的强烈性，有时就是通过他的“贪婪”和“野心”表现出来的。作品中有不少章节描写了他吞食同行小厂，残酷压榨工人血汗时，手段之阴险，用心之险恶，的确令人发指。但，我们只要稍加留心，也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的某些可取因素。譬如，当朱吟秋、陈君宜这些“庸才”把工厂弄得半死不活，即将走上“盘给外国人”的绝路时，他便“毫无怜悯”地计划将他们握到自己的“铁腕”中来。并向对此举百惑不解的汪派政客唐云山慷慨激昂地宣传道：

他们的企业到底是中国人的工业，现在他们弄到关门大吉，那也是中国工业的损失。如果他们盘给外国人，那么外国工业在中国的势力便增加了一份，对中国工业更加不利了。所以为中国工业前途计，我们还是要救济他们！”

① 丁尔纲：《茅盾作品浅论》。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不错，他的口吻是“贪婪”的，而这里的贪婪，却实实在在地站在民族工业的立场上的。如果我们能将视点再进一步转移到这一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我们岂不就更可以从这“贪婪”的“野心”中，看到他那强烈的民族意识所起的作用？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救活这些工厂，扩大民族工业的地盘；二是增加自己企业的资金，增强他同买办势力周旋抗衡的实力。再如，他在公债市场失利，工厂资金周旋不灵的情况下，转而向工人榨取血汗，甚至要“开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工人进出厂门都要受搜查；厂方每月扣留工资百分之十……”等等，这固然是资产阶级剥削本性的表现，是残忍的，凶恶的，“不顾工人死活”的^①。但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这样大刀阔斧整顿企业的最终目的，乃在让自己的企业“站住脚跟”，“打破老赵指挥下的经济封锁”。纵览全书，吴荪甫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和赵伯韬“斗法”的念头。强烈的民族意识告诉他，只有彻底打败赵伯韬，他发展民族工业的计划才有可能付诸实现。而此刻他正被赵伯韬的经济封锁弄得“骑虎难下”，陷于“四面楚歌”境地。为了从这重重围困之中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他采取这样做，从主观上看，是不能说没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的（至于这种做法在客观上的反动性，本人将在另一篇文章作专门论述）。恩格斯在谈到私有制社会“恶”的历史作用时，曾这样说过：“自从各种社会阶段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况——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以作为这方面源源不断的证据”^②，所谓“杠杆”，就是动力。对于历史上起过这样或那样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人物，如果我们以“贪欲和权势欲”的反动性来加以否定，那只是一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大力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指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并未因为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的一面而加以否定。虽然，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阶段，但当时的中国却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鉴于此，我们说吴荪甫在民族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买办势力的斗争中，敢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做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

程”^③。我们不否认吴荪甫有剥削的一面，有追求利润的一面，甚至我们可以指出他的这一面是反动的、腐朽的，但我们也切不可忘记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他的进步性”的英明论断^④。刘少奇同志曾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眼光，提出了那著名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剥削有功”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他针对建国初期亟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历史，明确提出，“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⑤，可见，对剥削这样一种罪恶，也必须看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作用，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才能定其功过的。如果我们能够由此从吴荪甫的民族意识出发，进而再联系到他彼时彼地的境况，那么，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岂不就很清楚了吗？

第三，我们认为，吴荪甫宁可走上破产的道路也不向赵伯韬缴械投降，以极其独特的方式表现了他的妥协，是他民族意识逻辑发展的结果。近年来，有不少同志对吴荪甫是否买办化的问题极有兴趣，津津乐道。他们或是认为吴荪甫的结局是破产而没有买办化^⑥；或是认为吴荪甫在“买办化的路上走了一段，想买办化而未成功时，他就被赵伯韬彻底击垮”^⑦，等等。其实我们只要从作品实际出发，就可以发现，吴荪甫在主观上是一刻也没有打算走买办化道路的。他最鄙视朱吟秋式的企业家，因为无能，把厂办得半死不活，最后叫外国人弄去。因此，当赵伯韬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使之“不仰赖银行放款，就等于坐待自毙”的情况下，他毅然奋起反击，决心在公债市场上同赵伯韬决一死战。他调集了所有的款项，把益中公司完全造成了“反赵大本营”，企图一举击垮赵伯韬，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买办势力的控制，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他失败了。失败之际，不得已将所属的八个厂盘给英商某洋行和日本某会社。这无疑是一种妥协，对于整个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来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30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④ 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5月19日。

⑤ 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⑥ 陈诗经：《论吴荪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5辑。

⑦ 陈金淦：《论吴荪甫》，《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这种妥协更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停留这里，我们将永远难以认清吴荪甫性格的特别之处。吴荪甫性格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妥协与否，而在于它的独特表现方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排挤下，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压迫下，大多都走上了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的道路。这可算作民族资产阶级的共性，吴荪甫自然不可能超越这个共性。但是，吴荪甫终究没有向美国金融托辣斯的代理人赵伯韬妥协，没有将益中信托公司或其所属八个厂盘给老赵而出顶他人，这就是吴荪甫的个性！他的狷介、刚愎的变相反映。明明软弱了，退让了，却要逼过“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就赋予吴荪甫这个人物以无限的生命力，使其更具有典型性，也符合他民族意识的逻辑发展。因为，吴荪甫的妥协中包蕴着抗争。他将益中八个厂盘给英、日商的目的，在于调集现金，同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决一死战。同时，对英、日商的妥协本身也意味着对美国财团及其掮客赵伯韬的报复。从整个情节发展的逻辑轨迹出发，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吴荪甫一旦取胜，他是一定要由英、日商手中赎回自己工厂的。更何况，吴荪甫的那八个工厂根本不是象周仲伟那样去“抵押”给某外商，而是“出顶”给英日商人。虽仅二字之差，却聚满了吴荪甫的心机。“出顶”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已与这些厂断绝了联系，不是和英、日商合伙经营，也不是象周仲伟那样跑到“东洋大班”那些去拿佣金，把自己“变做他们支配下的大头目”。当然，这里有经济上的考虑，但，不甘当帝国主义的变相买办，则不能不说是吴荪甫当时所思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为拒绝走上买办化道路而最后挣扎。从中，吴荪甫民族意识的顽强性终于可见一斑。所以，他和他悲剧的命运深得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感是植根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基础之上的。尽管一九三〇时候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了。但是，作为这个阶级具体成员的政治态度，却并不相

同。他们中间也有左、中、右之分。尤其是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浪潮的冲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直接危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会做出不同程度的反抗和斗争。吴荪甫这个艺术形象，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吴荪甫既反蒋又反共，既与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有矛盾，又同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利害冲突。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状况，使他无法摆脱必然失败的命运结局。但是，他的顽强的民族意识，他和赵伯韬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又使人们为那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一九三〇年间民族工业前途产生了无限怜悯、担忧和同情。华夏本为一体、炎黄毕竟一家，大敌当前之时，民族利益将具有民族意识的仁人志士组成一条战线。如果将吴荪甫和一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转变，和茅盾在其他作品中所塑造的民族资本家何耀先、林永清等联系起来，就更能看出吴荪甫这个艺术形象的不朽生命力，更会钦佩茅公赋予吴荪甫民族意识顽强性的胆识和远见。这里充分表现了茅公对社会思考的深邃和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一九八一年当《桑弧》这部名著搬上银幕时，茅盾向他强调的第一原则是：“要突出吴荪甫和赵伯韬的不同，他原是有民族意识的资本家”^①。非常遗憾，由于改编者对这一告诫领悟不深，改编后的影片对吴荪甫的民族意识强调、突出未达到一定尺度，终于造成了影片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题外话了。但是，茅盾晚年的这段重要提示，应是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吴荪甫这个艺术形象的重要契机。

吴荪甫的没有投降，没有走上买办化道路，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中是属于特殊的。然而，这个特殊个性充分的内在根据，就是他民族意识的顽强性。这也是他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反过来他又更能代表一般。由此，人们，包括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领袖，对吴荪甫悲剧命运产生同情，岂不顺理成章吗？

① 《上影画报》1982年第1期。